

人品好，很谦逊，从不摆名人架子，总是热心地培育后辈。他对钱财看得很淡，爱说，钱财身外物，生不能带来，死不能带去，何苦看得那么重？一代文坛大师走了，但他的人品、文品等优秀遗产却留给了后人，使我们受益无穷。怀念他的又何止是他的二姐和他的至亲至爱？

飞将军张惠长传奇

张道生

飞将军张惠长,从1920起到1932年,曾是孙中山元帅府的侍从武官,后被孙中山赏识,派送美国学飞行,成为元帅府的首批飞行员。往后,跟随孙中山讨袁护法、平定内乱、保卫广州革命政权;在组建元帅府航空局中建设革命飞行队,创办航空学校,培养航空人才;在团结御侮,捍卫领空,抗击日本侵略者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少贡献,荣获中将军衔。他一直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积极执行孙中山“航空救国”的意旨。当他发现国民党政府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时,他挺身发出了“空军人员誓不参加内战”的全国通电;他动员广东的空军人员(近百人)脱离广东军政府的航空局,去支援坚持抗战的福建人民政府(反蒋抗日的一次短暂的国内抗日统一力量)。从此成为蒋介石入案“永不重用”的眼中钉。只幸他还有孙中山派系作“后台”,因而蒋介石未敢向他“开刀”,反让他当驻古巴公使,想“磨滑”他的“头角”。公使任期届满后无奈还让他当个中山县长的“芝麻官”。这时,日寇已入侵广东,他还有孙中山国共合作的意识,响应中共中山县委的号召,积极抗日,担任抗先队队长,亲赴前线,同中共的地方抗日力量并肩抗战。至今,中山人民对他仍很怀念。

这样一位人物,有不少传奇轶事,现举几件以飨读者,也以此

感激怀念他的朋友。

一、 离奇的一家

这位飞将军有过三个女人。只有首位女人给张家留了个骨肉。第二位是他的正室，凭她是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家政系学士，同上海买办陈廉伯有点关系，当飞将军参加北伐、胜利凯旋上海时，她神速地拥有了他。然而，飞将军与首位女人，早已订婚，也怀上了张家的骨肉，还是这位学士出了“高招”。她用金钱加上甜言蜜语，尤其“笃穿”首位女人是如何如何配他不上，甚至会拖累家人等等。首位女人只好就范，同意在原广州博济医院里把孩子生下来，保证不见孩子一面，由护士带走。这时，正室夫人刚刚跟飞将军结了婚。她只好请博济医院护养这名婴儿，起码过一年时间才领回来，作为自己的孩子。这名婴儿就是本文作者，有幸未随飞将军去台，能努力于孙中山未竟革命伟业，为民族、为国家尽点绵力。

以后，一系列离奇的事随之而来。这个婴儿却是个“七星仔”，个头很“歪”。正室夫人曾形容说：“像只猫仔，十分讨厌！”认为一个“官太”的身份是极之不愿带在身边，更没有赐予一点母爱，交给保姆了事。保姆也没有用心，婴儿得了麻疹，把眼睛也弄坏了。其时，远在中山家乡的祖母知道此惨况，担心这个唯一的骨肉的命运，孑然去上海，把婴儿带返中山来悉心抚养。事情可巧！这位正室夫人不久患上葡萄胎，整副生殖器官都割掉，不能再生育了。她曾想方设法弄回那个“七星仔”，可是老人家担心她不会好好侍养，总不肯放走，死死地护住这点骨肉，导致往后的20年里，她先后领养了一女两子，可惜都没有好结局！女的比“七星仔”大8岁，婷婷玉立；作为姐姐，是个“心肝儿”左随右伴。可是，这位千

金却同当时官府的司机相好，经夫人多次劝阻，仍是“情比金坚”。最后，干脆离家逃婚了事。

不甘孤寂的夫人，抗战避难于澳门时，由于老人家始终不同意把“七星仔”交还给她，她只好从孤儿院里领养了一位混血儿。

这位“杂种仔”跟随到台湾后，品性恶劣，五淫俱全。一日，被两个舞女搀扶返家，要父亲给他30万元(台币)还赌款。从此张家正式通过法律与其脱离关系。但夫人还是体恤他，给了一些钱，让他买了部货车去搞运输。

早在解放前夕，夫人的弟弟在中山弄到个姘妇，还生了个男孩。这时夫人一眼就觉得这男孩很像自己，把他作为“己出”，成为她最小的儿子，一直用心抚养，大学毕业后，去了美国，成家立业。1980年，飞将军在台逝世后，夫人一心去美国投靠这名小儿子。哪里知道，这名“儿子”在美国时早已同自己生母相认，把夫人敷衍了事，送到低级老人院。夫人哪能受得了如此际遇，只好返回台湾。以后还是幸得那位“七星仔”关怀，动员她返回祖国。在1985年，她已经愉快地在亲戚陪同下从台湾飞到香港，等候“七星仔”来带她回广州。可惜她是个老心脏病病号，因为一喜一怒，在当晚10时突发心肌梗塞而去世了！“七星仔”只好把她骨灰带回祖国。到此，这个离奇的家，只剩下唯一的一个“七星仔”了！

他的第三个女人，是原来征得夫人同意，用公鸡娶回来的妾侍，言明只是侍奉在家乡的两位老人家，不能同飞将军同居。后来由于抗日战争，陪奉老人家上内地，与飞将军有过同居生活。夫人就认定是违反协定，把她逐出去，但两位老人家是不承认的，一样供她去上大学后来成了妇产科医生，现仍健在。她已经有了自己的新家庭。

二、“小学鸡”当上飞将军

飞将军幼年是在家乡的外婆家(沙边村)读小学的,小学还未毕业。有一天,孙中山元帅府航空局局长朱卓文返家乡(西樵村)。他是飞将军的表叔,来到飞将军家里做客,见到飞将军长相英俊,体魄伟实,尤其是飞将军前额正中有一颗明显的黑痣,认为是个奇遇,是个不同凡响的长相,把他带返元帅府介绍给孙中山。从此,他有机会在广州继续读书。当时元帅府正着力筹建“革命飞行队”,让他在外语上多学习,以及其他基础课程。直到1915年,时值17岁,同杨仙逸一起先送到林森奉命在美国成立的中国国民党空军学校,后再转入美国纽约寇狄斯航空学校深造。1917年回国,致力于中国空军的建设,是早期航空事业的开拓者、建设者和领导者。

1918年,在广州的大元帅府正式成立了航空处,飞将军当了副处长。接着建立了“中山飞机队”。飞将军同杨仙逸各驾大小“鸭婆机”,炸毁了叛徒莫荣新的指挥所,莫逃离广州;在陆军未赶回参战情况下,收复了广州。这是当时空军的第一次立大功。孙中山认定“飞机将是未来战争决胜之武器”。

从1922年初起,孙中山组织第一次北伐,往后的七八年间,飞将军组建起元帅府的空军,在北伐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中,他曾说服了直系军阀孙传芳的一班飞行员,实行“打假波”,不积极阻击北伐军,让北伐军长驱直进。最后北伐军到上海时,飞将军还策反这些飞行员,接收了军阀的全部飞机和器材。他们以后在北伐和抗战中,都立了丰功伟绩。

飞将军一直受到孙中山的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主张的教诲。直到1930年,由于他在北伐中屡立战功,又有过长途飞行的壮举,

当时身任海、陆、空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很妒忌广东空军的崛起，急待控制，就通过孙科，说服他担任了南京政府的航空署长。他对蒋介石叛离孙中山的种种行径有所警觉，坚持兼任广东航空处处长职务，从而让自己有更多时间留在广东。当时李济深、陈济棠一帮人已在蕴酿反蒋抗日。飞将军兼任广东航空处长是想把持住自己亲手建立的空军，有朝一日能为反蒋抗日效劳。

可惜，后来陈济棠存有自己当“南天王”的野心，飞将军眼见又是一场军阀内乱的局面，正好李济深、蔡廷锴等人在福建建立反蒋抗日的人民政府，飞将军在发出“空军不参加内战”的通电后，就动员广东空军近百人脱离陈济棠，到香港去声援福建人民政府。

后来，飞将军在同“七星仔”谈家常时，曾逗笑地发问：“你猜猜我当空军司令时，有多少架飞机？”当时以为猜到10架，是很保守了，原来只有4架！后来，经过一翻努力，到第一次北伐时，也不过是12架啊！

他又对“七星仔”讲了个趣事：他们去炸军阀的阵地时，是用双翼的飞机，那时没有专用的轰炸机，这种双翼机左右机翼只能各携两个50磅的炸弹。他认为远远不足用，他就在机身腹部开了个“井”形口，自己坐在用粗铁丝捆紧的竹凳仔上，手持炸弹往下投。那时是杨仙逸驾机，他作投弹手，嘴里不时地嚷着“左的、右的、高的、低的”。结果，还是投不准，但起到很大的威慑作用，有力地帮助北伐军取得节节胜利。

三、 长途飞行的内情

1928年，飞将军擎起孙中山“航空救国”的大旗，组织两架飞机分两路长途环飞神州。他偕同杨官宇、黄毓沛、杨标三人，驾“广州号”机经汉口、南京、北平、沈阳，转往天津、上海返回广州，全程

5600 公里。另一架“珠江号”，由他的副手陈庆云领队，沿华东海岸，经汕头、福州、宁波到上海，同“广州号”会合后，齐飞烟台、天津，后又飞往长沙、桂林一起返广州。当时是在没有陆空无线电通信，没有导航设备，单靠罗盘指示方向和目测校正航线而完成的，此举是中国航空事业的首创，曾一度掀起了全国的“航空救国”热。每到一個城市，都轰动了传媒，成千上万人集会欢迎。到沈阳张学良出面欢迎。在南京受到冯玉祥、孙科、吴铁城、古应芬等政府要人及各界代表近千人的欢迎。

飞将军为什么要冒这么一个险？1945 年抗战胜利后，他再任中山县长时，向“七星仔”回忆起这段经历，吐露了当时的心态，也可以说是组织长途飞行的内情。他说：“连续 10 多年，孙中山培育我成为中国的首批飞行员，为北伐效劳，取得显赫成绩，日益显示孙中山的‘航空救国’宗旨的正确。我也着了迷，在我亲自驾机去讨伐军阀和由我组织空军去粉碎各路军阀的战斗中，自己也觉得‘空军的确系重要致胜因素’，所以向自己许下心愿：一定要认真积极执行孙中山的‘航空救国’意旨。当时自己也确有野心，认为：只要在这方面再下功夫，肯定能够飞黄腾达。可惜 1925 年，在我感到巅峰出现时，孙中山逝世了。”

飞将军又说：“蒋介石这时全力在应付各路军阀的割据，以及对付国民党内一帮反蒋势力的崛起，他对当时由全国各地地方势力控制的空军是举棋不定，对那一方都不表重视，同时处在受冷落状态。当时‘航空救国’的意旨在我脑海里是强烈地翻腾着；同时又受到美国飞行家林白在 1927 年完成了从纽约至巴黎 33 小时 30 分，航程 5810 公里的长途飞行的启发，如我能在中国搞个长途飞行，肯定会一鸣惊人，飞黄腾达的。那时，我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估量了自己和各位飞行员在 10 多年的北伐战斗中的成绩和大家的飞行资历，我认为是有把握的。我将这个想法同我的老乡、航

空处副处长、飞行技能较高的陈庆云商量,他很赞同。马上,我同他先进行试飞,对飞机性能作了鉴定,又在各方面作了充分准备,才组织这次长途飞行的。”接着他沾沾自喜地回忆:“这次壮举是完全达到了我的心愿。我们两机共经过了10多个大城市,都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各路政要的接见和欢迎,我已是轰动全国的新闻人物。蒋介石对广东空军另眼相看,通过孙科来动员我参加南京政府,当航空署署长,授予中将军衔,成为名副其实的飞将军。”事与愿违啊!1933年在广东的陈济棠,要当“南天王”,组织反蒋军阀集团,眼见飞将军被蒋介石收买了,就另立黄光锐为他的空军司令,让飞将军充当有职无权的集团军高级顾问;蒋介石则日益暴露他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嘴脸,飞将军挺身通电反对内战;他得知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在福建组建人民政府飞机队,飞将军即明确表态声援,后来飞机队是组成了。飞将军深知这一反蒋行动逃不了蒋介石的惩处。他也向“七星仔”透露过他当时的策略。他说:“做了这样一件反蒋的事,我如果一起去福建,只会连累全体空军战友。我在上海有夫人。夫人在上海同吴铁城、陈廉伯、林森有较深的交往,我又是太子派(孙科)的人,孙科当时也在上海。我到上海就有靠山,还希望通过这些人物向蒋介石求情,给我点出路。果然,总算能如愿地逃过惩处,在1935年,派我去古巴当公使。我知道其目的是让我去古巴享受一番,感受蒋给我的恩惠,以后服帖地为他效劳。”事实上,蒋介石并没有那么大的度量,最后给这位飞将军贴上了“永不重用”的黑色标签,从而结束了飞将军的伟业。

四、开明、廉洁的县长

1937年,不再是飞将军的张惠长,任职古巴公使届满。这时

中山县正缺县长一职,而中山又是“模范县”,国民党政府规定要由国民党的中央执委才能担当,所以张惠长就当上了这个县长。

因为他刚从国外回来,所以在县治上,首先广罗人才,尤其是工、商业方面的。改建了发电厂,发挥水网地带优势,发展河道运输。他对当时的石岐镇市政建设很重视,亲临街道整治卫生,把石岐的主要道路修建一新。当时地方财政收入是不错的,但他没有把钱花在修缮那些残旧的县府上面。他除了在工、商业上投放资金外,更多是用在办学上。他在石岐没有自己的住宅,也没有用公款去修官邸,而是租用华侨的房屋作私宅。而在家乡的田产、祖居都是他父亲一手所置的。他在两任中山县长期间从未置过任何的产业(包括房子、土地商铺、股份);他在澳门那幢房子,也是他父亲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老板帮了个大忙,老板送给其父亲的。因当时没有办产权转移,1960年这位老板的孙辈们拿着屋契来要了回去。他在港澳也没有一点不动产,以致他到台湾后,因蒋介石入案“永不重用”,而要自己骑自行车去工作,他的夫人去当家庭教师以帮补生活。他确实是位“两袖清风”的清官。

1939年初,日寇已入侵华南,广东沿海日益受到威胁。他接受中共中山县委“联合抗日”的主张,自告奋勇组建和领导中山县守备队,吸收了一些曾于1932年参加过“一·二八”上海淞沪抗战的第十九路军的军官充任中、小队长,他自任总队长。当时,中共中山县委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酝酿成立“中山抗日先锋队”,经县委与张惠长协商,由张惠长、孙康(中共县委书记)任正、副队长。在中山抗战期间,他们两人紧密合作,亲赴前线,粉碎了日寇的多次进攻。尤其横门一役,大大振奋中山人民的抗战热情和信心。直到今日,中山各界人士都认定他是位开明的官员,在石岐的中山纪念堂里,陈列了他的一些事迹。

五、 错失五桂山所赐良机

1947年初,坚持反共的国民党中山县党部,一直以来不满意飞将军当县长时对中共五桂山区的宽容态度,还牵连起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坚持国共合作之举,县长任期未满,就撤其官职。此后,飞将军隐居故里,以冀享度晚年。

其时,“七星仔”在广州读书,每逢暑假必返乡,常与村中小学时同学聚旧。同学中有中共地下党员(家乡早已建立中共党组织),他们策动“七星仔”每年暑期回乡办夜校。飞将军被说服带头捐款捐物。夜校从1947年到1949年,连续办了三个暑期。五桂山革命根据地曾三次在夜校里发送宣传解放战争形势的传单。有两次是专送给“七星仔”转交飞将军劝他“弃暗投明,投靠人民”的“劝谏书”。“七星仔”早已了解,飞将军是心照不宣地默许地下党在夜校的活动,所以能够两次把“劝谏书”送到飞将军面前。第一次(1948年),飞将军只是轻淡地说了:“你就用心搞好夜校班,别多管闲事。”第二次(1949年),大军南下所向披靡之际,飞将军见到“劝谏书”时,沉默不语良久。“七星仔”斗胆地冲口而出:“时到今日,爸爸,应有个决断啊!”他还是沉默,后来以疑虑的眼光望着“七星仔”,沉重地回应:“我不能再有一次错误呀。”对这句话,“七星仔”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仍悟不出真义。只有在“七星仔”参加了革命工作,在有关部门动员“七星仔”做飞将军工作,劝他“回来投靠人民”,再与飞将军间接接触多次后,才有以下判断:因为飞将军长期以来是位反蒋人物,最后,却沦为一大帮反蒋的失败者,灰心丧气了,自认是输家。虽然他明白“劝谏书”是给他一个好出路,但是宿命论却使他毫无勇气冲破自身牢狱,只有“见步行步”!最后,他是在中山解放前一天,在想留难留的心情下出境去

了澳门。正如五桂山区的领导曾对“七星仔”说：“你的父亲是在我们的眼皮下放他出去的。我们当时还寄希望于他的。”飞将军错失了人民所赐予的大好良机了！

六、李济深出面劝回归

飞将军到了澳门，知道蒋介石决不允许他这帮反蒋人物去台。当时，“望有日反攻”的幻想仍充塞蒋的脑袋。后来，我们的统战工作不断取得成效，原国民党的头面人物纷纷回归。蒋介石害怕了，才多方设法搜罗这些人物，封官（虚职）许愿（极低酬劳），让他们去台湾。飞将军也在1960年前后去台，蒋介石保留他的“国大代表”身份，还给个什么“反共委员会”的虚衔。

1950年，李济深先生担任了我国首届政协副主席。他没有忘记曾派空军支持过福建人民政府的飞将军，刻意要劝谏他回国投靠人民政府。通过广东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找到了留在广州参加了军管工作的“七星仔”，要他去对父亲进行“劝返”。当时，在市内设置了一套居室，以便接待海内外飞将军的亲友。从此，“七星仔”定期向有关人员汇报工作进展情况，并商议下步做法。很快，根据有关线索，有关方面找到了飞将军那位隐瞒了身份留在广州的妾侍。因该妾侍出身贫农，又在张家资助下学了门妇产科技术，解放后留任于广州市儿童医院，担任保管毒剂的药剂师。本想通过她去做工作，无奈她拒绝了，她不愿再同张家有任何联系，更不愿勾起过往的悲苦遭遇。但她还是提供了留在广州和海外一些亲朋戚友的情况（那时“七星仔”同家人、亲属是完全没有联系的），使“劝返”工作多些渠道。

“七星仔”在1949年广州解放后不到一周，经地下学联的动员，被广州市军管会派去芳村区执行接管工作。

飞将军在离开前,曾把田产、家当分散到一些亲戚朋友名下。1949年底,驻飞将军家乡的军管代表,请“七星仔”返乡,做亲友的工作。这段时间,在家乡开过多次群众大会,在大会上“七星仔”公开宣布“同飞将军脱离父子关系”。“七星仔”经过对亲友串门拜访,成功地把所分散的田地(2000多亩)和各种家当全部收回来。所有这些动作,第二天,就有亲属去澳门向飞将军告状(当时未封关)。所以,当有关人员动员“七星仔”做“劝返”工作时,“七星仔”曾表示难办和信心不足。鉴于此,有关人员同“七星仔”议定了工作的原则:既然自己出面会碰钉,只能通过在海内外亲友去劝谏。从1950年直到1966年底,10多年间工作从不间断,走访拜会过当时仍留在广州的飞将军旧部(如丁纪徐、刘锦涛、卢传铭、敖仑等),他们都欣然乐助。“七星仔”也不断写信请在海外的亲友转呈飞将军。可是,这10多年里,飞将军仍对“七星仔”在家乡所做过的叛逆行为怀恨很深。每次亲友送上的信,他不拆看,随手丢掉。亲友耐心劝谏,他不作声、不表态,但没有怒骂。我们很关注这种心态。有关人员也鼓励说:“要耐心,继续做工作。”可是,“文化大革命”一闹,这项工作被迫停下来。

整整又过了10年,粉碎了“四人帮”,全国拨乱反正。这以后,改由省、市对台办出面同“七星仔”联系,着令他恢复“劝返”工作。就在振兴中华、春回大地的大好形势下,飞将军的态度变了,开始拆看呈上的信件,耐心倾听别人的劝谏,主动打听“七星仔”的情况,还恳求亲友帮忙说:“道生已为人父,成家立业,管不了他,他已认定自己的路子。帮我把他的儿子弄到美国去,好吗?(我们婉言谢却了)直到1988年,“七星仔”去美国时,亲友也曾要他留下来。1989年冬,“七星仔”接到从亲友转来的飞将军口信,还捎来一幅相片(是飞将军同旧部10多人的合影)。口信内容是:“这是你在台的世叔伯,都是空军的同事。我知道在广州也有不少这样的世

叔伯们,找个机会,请他们一起拍将合照来,我很想念他们。”还寄语“我明年会到东南亚一游”。“七星仔”带着这些口信和图片,向省、市对台办汇报,他们认为飞将军回心转意了。“东南亚一游”实质是来香港,有想返回大陆的某些迹象。省、市有关方面很关注这一情况,通知中山做好接待准备,中山方面在一些乡镇开了座谈会,征询大家对飞将军的看法。据说各方都表示欢迎,都认为这位县太爷做的好事多过坏事。

事与愿违!1980年7月初,飞将军在宴请旧部和挚友时,向医生求诉,允许他同大家喝点酒。这位医生是长期看护飞将军的,理解他的心事,又认为他的心血管问题已稳定多时,就嘱他少喝一点无妨。可是,飞将军因为这口酒竟遗憾终生!送院抢救,无济于事。飞将军仅差一步未能如愿返回祖国,投靠人民!

谱家国之哀愁 写民间之疾苦

——回忆我的外祖父黄少强

吴 裘

1963年9月,妈妈缝给我一个小书包,送我到东山区接官亭小学念一年级。在那“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年代,虽然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地进行,但还没有搞到平民百姓的头上,我们一家过着那风平浪静的生活。每当夏日,江风入室,父亲将一轴轴的古今书画挂满了房子的四壁,满屋书卷,真个无兰室自馨。每当晚上做完功课的时候,妈妈为了让孩子们早点睡觉,就给我们三兄妹讲外祖父的故事;一天讲一点,日子长了,还重重复复地讲。现在回想起那段童年诗意般的生活,实在念念不忘,还寻儿时味。2003年6月19日,广东省博物馆为纪念我的外祖父逝世60周年,举办了“黄少强画展”,我与家人前往观看了展览,不禁回忆起当年母亲给我讲外祖父短暂而又不平凡的一生的故事。现借此文史园地,扼要地将其记录下来,以作为对外祖父的怀念。有遗漏之处,请知情者补漏斧正。

黄少强,小名宜仕,生于清朝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诞生在广东省南海县官窑镇小江乡丰湖里一个有书香气味的小康之家。宜仕,是他祖父给他起的名,意思是想他将来投身于仕途。但是他却不走做官的道路,改号“止庐”,取“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的